

导论

现代化

自 从启蒙运动以来 关于人类发展的解释 有几种概念占了支配地位，一种主要是神学的历史观让位于较有批判性的思考模式。进步的观念是十八世纪的这种转变的早期成果。但是，它的倡导者往往过高地估计了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因而把先前所有历史时期都加以贬低。随着十九世纪初民族国家的形成，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过去。这种趋势导致了大批文献资料和政治文件的研究和出版，而这些资料 and 文件对于从王朝帝国废墟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国家的传统遗产都起着支持作用。然而这种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把一种民族传统与另一种民族传统对立起来，因而不能为全面解释世界历史提供基础。

与此同时，有些哲学家力图将人类发展解释为抽象观念的产物，以此为世界历史提供某种统一性。黑格尔将历史看作

是自由原则在一系列阶段中克服了对自由的种种束缚这样一个辩证过程的实现。这种看法对后来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他对历史的解释中使用了这种辩证法，期望无产阶级经过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长期斗争后取得全世界的胜利。在这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历史的基础，并以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形式在今天的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十九世纪奠定基础的、对史料的研究和批判所形成的共同传统是当代一切历史著作的基础。这些批判原则由于借用了其他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大大地完善了。人类学有助于加深对口述史料和考古史料的理解和使用，也有助于加深对那种把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和世界观考虑进去的全面参照系统的价值的认识。经济学不仅有助于比过去更加准确地观察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与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而且也有助于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结构作出更精致的度量。政治科学家们分析了权力组织和决策机构，并对政治参与的性质殚精竭虑地作出评价，这对社会研究很有用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研究了人类的生物性对社会与生活的关系，研究了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认识的发展，以及这个认识怎样影响了行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在分析形成一切人类行动基础的社会结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还研究了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的凝聚和发展中如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功能。

所有这些趋势造成了美国教育体系中讲授的那种历史观。但是，对历史材料总的解释被限制在种族中心论的视野之

中，基本上假定西欧和英语民族所创造的生活方式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这种可以简称为西方的或西方化的观点，往往在美国的高等和中等教育中占有优势。

例如 在高等学校一年级的标准课程‘西方文明’概论中，一般都对对欧洲文化的追根溯源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历经埃及、希腊和罗马。这个说法继续发展为罗马人的体制与许多蛮族的体制互起作用 形成了传统上所称的欧洲‘中世纪’而一种相当高明的描述则把这些体制的综合体称作“封建主义”。这个社会群体的相对静止性质首先由于十字军东征而告终，然后又更加决定性地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终止，这两个运动形成了近代和当代的基础。

这种历史观一般都把其他社会的历史看作是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因此，俄国在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土耳其从 1839 年的改革运动、日本从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开始，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亚洲和非洲的一些社会直到二十世纪赢得独立并且被说成是采纳了西方政治体制后才成为这样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对“西方文明”的各种不同解释都往往和这个总的看法相一致。从西方的立场看，无论是把西方看作自由和民主的根源，还是看作工业化的领导中心，甚或看作资本主义统治的罪恶力量，西方仍然被认为是决定性地取代着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传统文化。

西方对历史的这种解释的实质，是认为在近代的发展进程中西欧民族和英语民族产生出了最适应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这些制度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论点的力量基于下述事实，即作为现代特征的知识迅速增长，首先发

端于西欧，而西欧一些社会和它们在新世界的支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般地说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些知识去改进人们的生活。这些社会在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比较高的水平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已经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最“现代”的社会。因此它们认为它们的制度应当最适合于其他社会去仿效，也就毫不足奇了。

这种与西方化观念相关联的历史解释在美国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它特别关注个人摆脱国家的不应有的束缚，关注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建立，关注一种以最少的国家管制以便于资本积累和投资的制度。它还关注尽量促进与公共秩序和平等相符的个人自由。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反映在“自由”(Liberal)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上，而且是这种信念的核心。

当然，西欧国家和英语国家的现实与自由主义所持理想并非总是毫无差距的。然而，总的说来，这些社会的一般人民比其他地方享有更大的发展和自我表现的自由。在受到希特勒主义的真正威胁和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已被感觉到的威胁危机时，这些社会中的人民就以勇气和决心谋求捍卫自己的自由遗产。虽然与现代知识的潜力相比，这个自由显然总是十分有限，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它又是非常确实的。

对作为西方传统特征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问题，并不等于对西欧和英语国家比其他社会在提高人类福利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提出疑问。现在争论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成就的大小，而在于从这些成就中得出的关于世界历史解释的结论。那些赞成西方化的人主张，西欧和英语社会取得的成就的水平和制度——即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取

得这些成就的方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他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推论其他社会如果想要赶上西方，不仅应当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应当采用西方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等制度。

反映西方化观点的一个极端事例是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是否可以不要基督教而能建成铁路所展开的辩论——因为已经建成铁路的国家全是基督教国家。我们现在知道的答案是没有基督教（或民主制）也能够建造和经营铁路，不过不能没有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其他一些特征：科学和技术知识，为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动员大量资源的能力，以及与农业社会中通常的工作习惯显然不同的工作习惯。如果一个社会为了人类福利而要利用知识的进步，那就必须具备某些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并不一定要包括西方社会所采用的所有制度。

对西方化历史观的批判已集中在这一区别上：即现代社会中确实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与个别先进国家不同的制度传统在当代的各种变体中的那些特征之间的区别。这种批判既来自西方各社会内部，也来自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其他社会。在这些其他社会中，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当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以便利用现代知识呢，还是应当促使自己在制度方面的遗产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西方先进社会产生的最初影响是那么深刻，以致其他社会往往倾向于抛弃自己的制度而去全盘照搬西方先进社会的制度。这样的照搬多半是不成功的。富于思考的观察家于是逐渐得出了结论：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

“现代化”的概念包括有关人类发展的一系列解释。但是，

这些观点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假设，赋予了这个名词以特殊的意义，因而使它有别于其他概念。关于现代化这个概念，有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提出。首先，在现代以前的社会发展中发展出来的与现代化有关的接受能力的重要性；主要反映在科学和技术革命中的知识进步的作用，而知识的进步则是区别现代与过去各种变化的主要源泉；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对知识进步所提供的发展可能性加以利用的能力；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以图根据现代化的要求改造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并且有选择地向比较现代的社会借鉴的能力。

上述这些假设将在本文的后面两节中更充分地加以讨论。不过，这里仍应指出，对现代化过程的大部分解释都强调西方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在制度遗产方面的差别，并且认为后者在开始出现现代化转变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仍很可能保留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推论不仅可用西方社会的制度适应于现代性的要求，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用其他社会的制度来适应这种要求。较后发展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抛弃自己的制度而一味向西方借用各种制度，而是要评价自己的制度遗产，并且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它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

对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社会应当从它们自己的利益来加以研究，而不仅是从它们与西方影响的关系去研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影响不重要，而是说，对这些社会必须进行的对本国制度遗产的改造而言，它毕竟是次要的。

现代化概念对于人类发展的解释的一个重要贡献——相对于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就在于现代化更

强调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不大强调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更强调现代化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目标。

伴随用现代化对社会变革所作解释提出一些与其他看法稍有不同的共同观点一起，在主张这种解释的学者们中间，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方法也许是把经济增长看作社会变革的主要根源，并将其他任何事物都与它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所产生的问题之一是没有对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解释。它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的传统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把一切社会都看作在现代化过程中趋于一致。另一种方法是把经济增长看作理所当然，只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上。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社会变革的某些著作可能会增长我们对某些专题的知识，但是它往往不能把变化的更大的背景考虑进去。还有一种抱负更大，但也更冒险的方法则是试图全面叙述科学和技术革命对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产生影响的全过程。这种以人类学家为典型的整体论解释，试图使用一种极为广泛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并且特别注意社会变化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要这些关系可以达到用量来计算，就有可能在一个“体系”中显示出各个社会和民族的活动。

前文指出过，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法研究现代化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可是这些差别产生于对同一个论题的研究，因此不可避免会有许多共同之处。学者们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现代化的观点对某些专题进行研究时写出来的著作，差别可能不大。重要的差别在于由这些专题形成的一部分趋势和型式。

比较现代化

对社会发展中一些范围狭小的方面往往可以从各个国家的经历中进行最好的研究。但是，对于各个社会之间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等比较广泛的问题，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考查。现代化比较研究就是谋求了解知识的进步——科学和技术革命——如何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有所帮助。这样的理解自然涉及各个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中应当加以考虑的内在机会和危险。

这样一种分析从表面上看似乎规模很大，但对现代变革过程的任何研究都必须置于全球的和跨学科的框架之内。现代化比较研究首先要观察在现代知识的进步、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心理适应中所发生的空前变化。它试图认识和理解这些变化，评价世界上各种社会对待变化的不同政策所产生的后果，研究不同的制度传统对变化过程带来的接受能力或阻力。比较方法的应用可以减少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它并不认为当前在先进社会中的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型式必定适用于其他社会，更不认为这些政策本身不会有激烈的变化。

例如，就知识进步而言，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所关注的是：现代化以前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领导人物的世界观；学术争论的模式和结构；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社会资源分配比例；受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它的交流网络的范围和性质。对于欠发达的社会来说，主要考虑的则是它们向比较先进社会的借鉴能力，它们是否雇用外国

专家以及它们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接受专门训练的兴趣。所有这些关注或多或少可以衡量出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在政治领域中，现代化的比较研究集中考虑协调和控制的中央结构与构成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规模的大小和专门化的程度是衡量国家官僚政治发展水平的指标；这个水平还可以通过中央官僚机构的经费支出与地区和地方官僚机构经费支出的对比来衡量。政治制度还可以通过它的执政效率，即通过它维持秩序，不用暴力而能持续统治和获得公民支持的能力来衡量。个人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地区和全国的代议制机构等社会的正式机构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政党和特殊的利益集团等非正式的社会机构以及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他的社会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来衡量。各种社会之间的比较还可以用主要的政治思想意识去进行，特别是当这些政治思想意识涉及公私部门的作用的时候。

在经济领域中，无论是经济活动的结构变化还是经济增长率，都可以进行比较。人们习惯上把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人们习惯上也是从这三个经济部门分别使用劳动力的比例、吸收投资的比例、在国民总产值中占有的比例，以及各自的增长率来考虑。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虽然这些估计并不十分准确，但能充分反映各个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某个社会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的经济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增长率、原料和工业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以及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衡量。

在许多方面，对人类福利影响最明显的变化领域是所谓的社会流动——这种变化把社会从许多彼此孤立的、规模很小的社区转变为一个用教育、通讯、交通运输、城市化和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社区。由于知识的进步而使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导致出生率的突然上升，超过了死亡率，结果是人口爆炸，在好几个世代的时间里都无法恢复稳定。仅仅是这项因素，就给人类福利造成了障碍，因为如果人们要获得利益，生产力不仅必须有绝对的提高，而且必须有相对于人口增长的提高。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经理人员、各类专家、产业工人、职员和有技术专长的农场主构成的现代社会必须从一般由农民占五分之四的人口产生出来，而这样的转变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现代以前乡村中的社区意识和自助的意识都在某种程度上在城市生活方式中，在国立学校体制中的普及教育和儿童社会化中，在报纸、广播、电视和正在扩大的通讯体系中，在国家水平上产生出来。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仍然比农业社会中淡漠，亲切感和聚合力不强，个人具有一种难以衡量和估计的孤独感。此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层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收入的分配往往跟不上去。虽然从长期来看，一切阶层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提高，但即使在最先进的社会里，收入的分配依然是非常不平等的。

个人的性格产生于生物特性与社会环境——近亲、社区和个人所接触到的更大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生物属性和环境不同，性格也有差别。在现代总的变化过程中，形成个人性格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若要理解个人性格的适应性，需要衡量或者至少需要估价的是个人与他的熟人圈

子以外的其他个人心领神会的能力；个人对变革必要的接受力，以及对于为了获得未来的利益而有必要暂时推迟眼前满足的认识；还有个人对于同类人是按照其表现而不是按照其地位去评价他们的能力。与过去时代的个人相比较，现代的人格可被说成是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加关心对环境的控制，而且或许更少自恃，更不安于现状。现代化的心理方面不属于广泛研究的主题，不过十分清楚的是，现代人的特征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

作为一个过程的现代化

有关现代化的大多数论著都是讨论某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某些特定问题。但是显示这些问题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发生作用也是重要的。现代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更直接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从那时起，人类对于环境的知识迅速发展，而且看来很可能要继续发展到无限的未来。这种知识的增长对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无数细小的行动中产生了作用，而这些行动汇合起来就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把这个进程划分为各个阶段的做法当然都是人为的，但是，如果要使这项研究得以进行，这样做也并非不需要。

本书对现代化的进程作了最为简单的分期，即：准备时期、转变时期、高级现代化时期和国际一体化时期。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分期依据作者的目的和观点而各不相同，但是，对这些进程的叙述全都依据共同的资料。关于这些时期的特征，本

书在各编的序言中将加以概括，并且在所选论文中详加说明。

本书的各篇论文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成千上万篇论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的典型成果。这些论文是作为这一课题的导论而选出来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促进研究的兴趣，而不是把各个方面和各种观点包揽无遗。尽管在这个领域中论著甚多，但适合于本书的论文并不多。许多论文要么太长，要么太短，要么太笼统 要么太专门 要么太平淡 要么太怪僻。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在本书中有其代表，读者会注意到许多论著对正在展开的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作了公开的或含蓄的批评。不过，还应当记住，用现代化的概念对社会转变进行解释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目前它的特征仍然是问题多而答案少。这既是一种不足，却又是一种挑战。

第 一 编

现代化的概念及其批判

本书导论中所叙述的关于现代化概念的背景，将在本编前两篇论文中加以补充。第一篇将现代化的概念作了抽象的讨论。第二篇则评述现代化概念的主要发展趋势。

由于这本论文选集认为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转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在本书中所占篇幅不多。因此，对那些论点加以注意是适当的。一般地说，现代化概念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批判：认为这个概念比较含糊和混乱；认为这个概念有偏见，倾向于有利少数富有者的稳定和秩序，而不顾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和福利。

有些批评者认为 这个概念比较含糊 不够准确。他们试图找出一种理论，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不仅能够在一系列弄虚作假的陈述中解释其相互关系，而且可以预言一个偶然事件将导致另一个偶然事件。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科学的。他们问道：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能否告诉他们 资本主义是否比‘社会主义’更‘现代’些 哪种社会制度将在未来的若干年或若干世纪内在西方取代资本主义？哪些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型式最普遍地适应当前的科学和技术水平？

研究现代化的大多数学者并不打算关注在这种意义上形成的理论，至少在这一概念目前的发展阶段。他们的兴趣在于用一种更充分地考虑到人类事务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的解释，并且利用由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解释，去取代他们认为对社会转变所作的那种简单化的政治解释和社会解释。想要包罗万象地说明整个人类经历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够的，但是比那种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一切的努力更充分些。对那种认为这个概念缺乏严密性的批评，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估价，那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理论的严密性究竟可能达到什么程度，而那些被认为更为科学的概念或理论，又能达到什么程度？

有人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保守的观念，这种批判产生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实质上，这个问题最好用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冲突来表明。无论是经济、政治或社会的发展，都涉及积蓄率和投资方式，而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中央的协调，这一切都是难以达到的。苏联和日本在许多方面是处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叉中对立的两端。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有较高的积蓄率以及对资源和人力的集中控制。有关现代化的许多研究注意到，拥有一个高效率的中央政府传统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苏联，但也包括西方国家）比十九世纪以前那种尚未作为自主的政治实体存在的国家具有更强大的发展能力。

如果一些社会为了发展而动员资源 那么 政治上的控制和协调往往是一个前提。支持迅速发展的政策往往会使少数

特权人物以外的其他所有人暂时不能（或者至少推迟）获得满足。有些研究认为现代化是人们向往的进程，从长期来看，它给社会成员带来了利益。这种研究被批评家看作只考虑到上层社会、官僚和银行家的利益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而牺牲了劳动和缴税的绝大多数民众。从这种意义上看，后者是被剥夺者，要求他们暂时放弃满足，而少数特权人物却可得到眼前的利益。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将在本书第三编的序言中加以陈述，它所作出的估计，证明在社会转变过程中，全体人口中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分配——即划归收入和福利的而不是用于投资的资源配置——一般被视为与经济迅速增长相对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似乎已经导致了一种资源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一种转变，即从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转向优先考虑福利。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观点认为，统治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不顾广大国民的自由和福利，而是导向经济增长、战争和腐败。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是选择另一种政策，把财富的平均分配和收入平等看作高于一切。有人会认为，中国采取这种政策是由于非采取不可，因为它的人口与粮食和其他资源的供应能力相比，为数过多，而在先进国家中，如果它们的贪得无厌迫使它们退回到现有资源的极限时，它们也不得不从发展转向分配。同样，以全球为基础来看，可以作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强烈要求富国与贫国分享财富，而不是牺牲贫国而使富国推行其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和分配在讨论中往往被当作是对立的，但实际上，生产投资和福利分配却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混合在一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西方国家用于消费分配的那一部分生产，比日本和苏联要大得多。

另一种观点认为有关现代化的一些著作旨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制订全球扩张计划，以此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免受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强调政治控制和协调则被认为是主张西方支持独裁政府，借以控制社会的不安定，同时也可以认为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来发展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由于现代化的概念不是一种严谨的学说而是包罗着各种各样的意见，所以可以发现例如鼓吹干涉越南的那些人也在现代化理论旗帜下置身其间。干涉印度支那的支持者把这个理论视为一种手段来防止（也许是由苏联或中国领导，或两者都领导的）革命的连锁反应，这场革命最终可能把美国牵涉在内。

比较狭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中包括以上的大多数观点，但是，他们的批评更集中在一些令人怀疑的解释上，那种解释指出工业化对一切社会产生的共同影响以及随着发展水平的接近而出现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近似的趋势。西方有关现代化理论的大部分著作都强调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斗争不断发展的阶段论是不相容的，这种发展导致最终进入一个以“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被苏联共产党奉为正统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代表着一种比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国家更先进的社会结构。相反，有关现代化研究的大多数作者则倾向于认为，在明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比其他许多社会较为发达，其中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社会和西方的社会，但不如西方最先进的社会

那样发达。

对于来自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批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于来自第一个方面的批判，应当作出的总的回答是要使人们注意到，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非所有著作都明确地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那些使用这个概念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既不同于那些强调政治制度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在形成这个概念的那些人中，也有多种多样。其中有极少数人认为“现代化”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但大多数人认为苏联类型的社会正在采纳可供选择的当前各种现代化政策中的一种。在这批人中，还有一些狭隘地拘泥于“自由”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法，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拘泥于“计划”一样。不过在这批人中，大部分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当前各个社会正在试图使它们的价值观念和制度适应科学和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在这样的适应中，它们正在颁布多种多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有的来自各自社会的文化传统；有一部分来自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外国的影响；也有一部分来自年复一年地在适应和借鉴中获得的有实用价值的经验。

对现代化概念的批评者往往还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先进社会和对发展中的社会应当同样予以注意。有大量文献讨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往往把它们称作“后工业化社会”，有的还讨论民族国家结合成为更大单位是必然结果。虽然有些人把国际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看作一种以强凌弱的工具，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它们是世界性融合的先驱，正像在建国过程中，全国性的机构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压倒了地区性的和